



前孔子时代的书籍与经典*

徐建委

摘要:书籍的功能在古代是多元的,并非所有书籍都是为了阅读而制作。通过研究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等考古资料,可以观察到早期书籍形态的演变。从甲骨文所提供的各种证据,包括甲骨上遗留的用毛笔写的文字、表示书籍的“册”、文字书写方向、甲骨上模仿竹简的格线等证据,我们可以知道在公元前14世纪已经有了书籍。公元前9世纪,一些仪式和祭祀中的歌诗、先王的诰命、世系的历史等与祖先祭祀相关的文献被视作教化的文本而被选择出来,被赋予重塑信仰、身份认同、维系宗族和昭示等级的功能,这些文献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经典书籍,是知识、观念和文化的载体,纳入了贵族的教育,以重塑周代社会。

关键词:书籍史;书籍形态;阅读行为;篇目次序

中图分类号:K22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2-0108-11

在早期文明的历史中,书的形态和功能与今天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古代书籍和今天书籍之间的差异性,那些差异性很多时候并不是平面的,而是呈现出历时性,体现的往往是早期书籍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特征。随着它们在性质和功能上逐渐接近现代意义上的书籍,古今书籍之间的差异也就逐渐消失了。通观整个早期中国书籍史,其间书籍的功能和形态发生过两次大的变化,或可称之为早期书籍史的两个转折期:一是孔子及其弟子的时代,二是公元前1世纪末。公元前6世纪,东方诸侯,特别是鲁国开始编纂新的经典,其中最重要的是《诗》和《书》。至孔子时,他将这些新编的经典用作教材,突破了周代贵族宗法制度的围墙,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各个阶层的人,并赋予这批经典中的思想和观念以超越性。孔子死后一百年内,大量的文本被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以及三传弟子写作出来。从各种文献信

息分析,它们几乎是公元前3世纪以前思想类书籍材料的主体。可以说孔子及其弟子的时代是后世两千五百多年书籍和学术文化传统的奠基时期。前孔子时代是书籍文化真正的早期阶段,孕育了多种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1世纪末,则是绝大多数早期中国的经典和非经典文献都逐渐定型的时期,特别是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刘向主持整理了西汉未央宫的藏书,除了极少数书籍外,绝大多数书籍的形态都发生了大的变化。那些已经有基本轮廓的书籍被重编,它们的各种不同版本被汇集到一起,相互校勘、补充,并写定为一个新的版本。各种散见文献则被刘向编纂为一部重新命名的书籍。这些书籍的基本结构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生过大的改变。我们可以把公元前6年以前的历史,看作中国书籍历史的早期阶段。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历史时期,会发现如下问题与今天的认知颇有不

收稿日期:2024-11-10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重大研究工程项目“文明史研究工程”。

作者简介:徐建委,男,“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主要从事战国秦汉学术史、文献学史、文学史研究。

同,即什么是一本书?是否一卷竹简具有了书的形态,就可以被认为是一本书?那时一部书的功能是什么?是否所有的书都是为了阅读而制作的?

越是古老的年代,书籍的功能越是多元。“给人阅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不是大多数简册的主要制作目的。当绝大多数的书籍开始有了预设的读者,它也就成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角色。阅读行为是我们观察书籍形态和功能变化的一个有用的角度,战国以前我们只能看到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以及盟书、陶文等,并没有书籍实物留存下来。若要去研究战国以前的书,途径应该只有两个:一是利用形成于战国之前的文本。《诗》《书》等经典文献中有古老的文本及其编纂细节,可以部分还原早期书籍的形态。二是利用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特别是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从这些文本中观察阅读行为的细微变化,从而去接近中国书籍的早期阶段。

一、甲骨文时代书籍存在的证据

在《尚书》和《诗经》作为经典被编纂之前,书籍早已存在了。甲骨文研究者都会承认,甲骨文时代的主要书写载体是竹简,竹简也已经被编连起来,成为一卷卷的书。这一事实有众多证据。

第一,首先要说明的是,甲骨文中占绝大部分的卜辞是占卜档案,并非直接的书面语言证据。甲骨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占卜记录,另一类是非占卜记录。已知刻有文字的占卜用甲骨总数超过16万片^①。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对上古卜筮有着简要的叙述:

古代中国人占卜的方法有很多,主要的是两种,即卜和筮。卜是用乌龟壳或牛肩胛骨,先施钻凿,后用火灼,求得卜兆,据以判断吉凶。这类占卜使用过的材料已经发现了,从新石器文化到殷周,要以十万计。……筮是利用著策,按照一定的方法左数右数,求得几个数目字,借以判断吉凶,所以古人说“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这方面的古书流传下来的有《周易》。^[1]

卜辞的功能是将占卜记录刻下来,以备核验其正确率。《周礼·春官》曰:

卜师掌开龟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义兆,四曰弓兆。凡卜事,视高,扬火以作龟,致其墨。凡卜,辨龟之上下左右阴阳,以授命龟者而诏相之。^{[2]1946-1948}

萑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蒸燠,遂歛其燠契,以授卜师,遂役之。占人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视吉凶。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2]1955-1963}

《周礼》出现于战国晚期,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末,与甲骨文的时代相差了将近一千年,其中记载的占卜细节或许有所不同,但卜筮之法世代相传。《尚书》《左传》《仪礼》记载的占卜过程也与《周礼·春官》的记载大体一致,故《春官》至少记载了贞卜的基本轮廓:占卜之前,有分工明确的制作卜甲或卜骨的工序;占卜之后,会将所占之事,所得之预测(应包括所占之兆象、爻辞,所筮之卦象、卦爻辞,以及预测)书之于帛,与所卜之龟甲或牛骨合藏于室,待年终之时,将所有占卜档案取出,查看帛书及卜骨,检验占卜的成功率。即《春官》所言:“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2]1963}将占卜内容、应验与否记录到帛上以备核验应是战国时代的方式,甲骨文时代则是直接将这些内容刻在甲骨上相应的兆象旁边。

将占卜记录刻在卜甲或卜骨上,是中国古代占卜历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只有在商晚期和西周早期才集中出现了甲骨文,此前和此后虽有甲骨出土,但并没有发现甲骨文。即使是商晚期,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有文字的仍占少数,刘一曼对甲骨文出土的基本情况有一个概括:

(一)在殷墟范围内,发掘面积稍大的遗址都有卜甲、卜骨出土,可见占卜风俗在殷代极为流行。(二)无字甲骨与刻辞甲骨出土最多的地点是小屯。……小屯共出刻辞甲骨15.5万多片。无字甲骨之数则难以统计,估计比有字甲骨之数量更大。……(三)小屯以外,花园庄东地、侯家庄南地出土的刻辞甲骨亦较多。……这两个地点的

刻辞甲骨均以卜辞占绝大多数,卜辞的内容也很重要。(四)除上述三个地点外,四盘磨、薛家庄南地、后冈、苗圃北地、花园庄南地、大司空村均出土过刻辞甲骨,但数量很少。六处遗址共出刻辞甲骨19片,且绝大多数属于习刻。(五)小屯甲骨,以卜甲为主……花园庄东地甲与骨之比例是98.4:1.6,甲的数量相当大。侯家庄南地为1:1。苗圃北地甲与骨之比例为55.7:44.3,甲比骨稍多。殷墟其他的殷代遗址,卜骨比卜甲多。^[3]

将卜辞刻于甲骨之上,应是殷商王朝最高等级占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从《周礼·春官》记载看,王朝的占卜分工极为精细,将卜辞刻在甲骨上的人,并不是占卜的人。饶宗颐发现了同一批有“甲午”日刻辞的甲骨,占卜者至少有四个人,但记录这几个人卜辞的甲骨文,字体风格统一,明显是一个人所刻,“可见当日契刻者乃别由史官任之,与贞卜者异其职掌”^[4]。甲骨文中,有一部分所谓的习刻,即练习刻字的甲骨,说明当时有以刻字为主的吏员,而不是径由贞人契刻。

不仅如此,有一类甲骨正面反面均有刻辞,反面仅刻占辞,正面则包括日期、占辞、验辞、占卜人等内容。如《甲骨文合集》^②第1075、17055、13399等。方稚松通过对比各类正反面均有刻辞的甲骨,认为“这类卜辞反面的占辞先于正面占辞刻写,是实际占卜过程中应验之前的记录,而正面相应的内容则是应验后的重刻,这就是导致正反面皆有同样占辞内容的原因”^{[5]14},“这类刻辞反面的占辞很可能是占卜活动当时的占卜记录(其相关的前辞、命辞应是在骨条位置,宾组卜辞的占辞习惯刻于甲骨背面),等到所卜问的事情应验后,再将前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全部内容刻写于正面骨扇的相应位置”^{[5]15}。这种双面刻辞说明,契刻者在占卜完成、尚未知道结果之时,便已经将占卜的内容刻了下来,以保证最终的刻辞没有错误。

由此可见,甲骨刻辞的形制很像是一种监控制度,占卜结束后记录下结果,以检验一段时间内占卜的应验比率。在核验之后,这批甲骨会被集中收藏或掩埋。所以这些刻辞并非日常书写文字。然而,占卜之所以可以被记录,恰因

为当时的文字和书写体系已经成熟,足以记录占卜的各个环节。

第二,在甲骨文中,有两个表示书籍的词语:“册”和“典”,更有成熟书写体系存在的痕迹。“册”是象形字,画的是用线编连的木制或竹制的简。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末至公元前12世纪初),很多占卜用的龟甲或牛肩胛骨上除镌刻文字外,还有用毛笔书写的黑色或红色的字,学者们称之为书辞。据刘一曼统计,有书写文字的卜骨有26片,“除《屯南》1453字在卜骨正面外,其余全部出于卜骨反面的骨边上,为倒书。具体说来,若卜骨正面有刻辞的,其反面的书辞方向与正面的刻辞相反”^{[6]546},“13片卜骨书辞,和未录内容的13片小片的书辞,其上均无‘卜、贞’一类的字,单纯是记述事情的,表明它们都不是卜辞。这些记事书辞的内容多与祭祀祖先或祭祀时的用牲有关。在正面有刻辞的卜骨中,书辞与正面刻辞在内容上毫无联系,在书体上,书辞字大笔肥,与刻辞相差甚远,这些差别显示出卜骨上的书辞与刻辞大概不是同时所作,两者性质是不同的”^{[6]548}。书写有文字的卜甲有48片,全部书写于卜甲的反面,文字方向与正面的镌刻甲骨文相同。“书辞的位置多在甲桥和中缝之两侧。它们的时代都属于武丁时期”^{[6]548},属于早期的卜骨。其中有23片的书写文字可以读懂,有7片的内容是“某人若干,某来若干,是记贡纳龟甲之事。这类书辞与武丁甲桥记事刻辞内容相似,它们作于占卜之前,所以,书辞比同版刻辞的时间稍早”^{[6]549}。另有16片“均属卜辞,而且占辞占有较大的比重。内容涉及天气、求年、祭祀、征伐等方面。这些书辞卜甲,大多正面或正反两面都刻着卜辞,书辞与刻辞的内容是密切相关的”^{[6]549-551},“这类卜甲书辞与同版的刻辞,都是占卜后的记录,有的还记载相同的事件,书与契的时间基本上是同时的”^{[6]551}。

至于甲骨文是先书后刻,还是先刻后书,董作宾、陈梦家、胡厚宣等对此均有论述。刘一曼系统整理了甲骨书辞后得出的结论是:

1. 甲骨书辞一般是字大、笔肥,书于甲骨之反面。卜骨书辞为倒书,内容属记事。卜甲书辞正书,一部分属记龟甲来源

的署辞,大部分属卜辞,且多与同版契刻的卜辞,内容相关。

2.甲骨文大多数是不书而刻,仅少数是先书后刻的。即甲骨上的小字均不书而刻,甲骨上的大字也多是不书径刻,只有武丁时的某些宾组及自组大字甲骨及帝乙、帝辛时的兽骨大字记事刻辞,是先书后刻的。

3.甲骨上的书辞并不都是为刻辞而作的。殷代书与契有一定的分工,未必是同一个人所为。^{[6]554}

一部分非占卜用的甲骨,上面所刻的文字,也是按照毛笔的痕迹刻下来的,与卜辞所使用的简易刻画很不一样,如著名的宰丰骨柶,“刻辞笔道丰肥,头粗尾细,书体风格如毛笔所书,应该都是先用毛笔书写而后加以契刻的”^[7]。这显示公元前13世纪末,不仅制作书籍的各种物质条件已经具备,而且文字书写体系也已成熟,作为书的物品应该出现了。但由于简册极易腐烂,考古学家发现公元前12世纪或公元前13世纪的竹木简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便如此,表示书籍的字,以及毛笔书写的文字或句子的出现,说明简册形式的书籍最晚开始出现于公元前13世纪。

第三,商代的文字,为了适应竹简书写的需要,会改变一些宽体字的方向。甲骨文时代已经有非常成熟的书写体系,这时的文字为了适应竹简的形制,在字形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云:

汉字自上而下的直行排列法,显然早在商代后期之前就已经确立。所以在甲骨文里,不少原来宽度比较大的字,如……“犬”、“豕”、“彖”、“虎”等字,已经由于直排的需要而改变了字形的方向。……在行次的排列上,传统的从右到左的排列法在商代后期,至少在后期的晚期阶段也已经确立。……汉字的这种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列方式,沿用了三千多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基本上为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的横行排列法所取代。^{[8]50}

像“犬”“虎”“马”等动物名称,原本都是模拟动物形象,因此是横宽的字形,但在甲骨文中,这些动物全站了起来,成为一个个立着的字。这

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文字为了适应竹简的形状而改变书写方向。

第四,甲骨文也并非当时的标准书写字体。裘锡圭对此有清晰的介绍:“在商代,毛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我们今天虽然已经无法看到用毛笔书写的商代典册,但是还能在商代后期留下来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看到少量毛笔字。金文基本上保持着毛笔字的样子,甲骨文就不同了。商代统治者频繁进行占卜,需要刻在甲骨上的卜辞数量很大。在坚硬的甲骨上刻字,非常费时费力。刻字的人为了提高效率,不得不改变毛笔字的笔法,主要是改圆形为方形,改填实为勾廓,改粗笔为细笔。”^{[8]47}“有时他们还比较剧烈地简化字形……我们可以把甲骨文看作当时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而金文大体上可以看作当时的正体字。……商代人有时也在兽骨上刻记跟占卜无关的有纪念意义的事件,这种刻辞的作风就往往跟一般的甲骨文不同,而跟铜器铭文相似,如著名的‘宰丰骨’(《殷契佚存》518)。在讲汉字形体演变的时候,应该充分注意甲骨文作为一种俗体的特点。”^{[8]48}对汉字的简化说明公元前13世纪的文字书写系统已经成熟。

第五,预设读者的书写形式已经存在。什么样的文本是预设了读者的呢?卜辞是记事文本,整体上是片段信息的连缀,属于短句或短语的组合,而非完整的语音形式的文字语言。它们被记录下来是为了占卜结果的核验,而不是为了保存信息或知识以传递给可能的读者。

因此,甲骨卜辞绝大多数都是短时效的信息,所以才会被遗弃或集中掩埋。但非占卜用的甲骨文却有很多长时效的信息,其内容偏重于纪念性记事。其中最著名的是狩猎骨柶,如前文提及的宰丰骨柶。这柄骨柶乃是用一条野牛的肋骨制成,正面刻字,背面雕刻精细的四层纹饰,正面的刻字,没有镶嵌绿松石,背面的纹饰间镶嵌了绿松石,并有部分残留。2005年安阳殷墟殷代大墓M11又出土了一件刻辞骨柶,下端残缺,刻辞记录了商王的一次田猎“壬午,王迪于召,延田于麦麓,获兕,亚赐……”^[9],文字上镶嵌有绿松石。绿松石的嵌入,显示这类骨柶有特别的纪念意义。M11位于殷墟保护区

围的西部边缘,其形制、面积、埋葬葬具和埋葬深度都无法与殷墟西北冈的王陵级大墓相比,里面埋葬的人是一位贵族。绿松石的嵌入,以及作为随葬品,都显示这柄嵌绿松石的骨器得到了主人的珍视。所以,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测,这是他在壬午这一天跟随王打猎而获得的赏赐。骨柄很可能就是用猎获的野牛肋骨制成的,以纪念这次田猎。骨柄上刻的字也是纪念性文字,这些字不是以符号的形式记录某些信息,而是以语言的形式记录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被记录下来是希望有人看到,是在向潜在的观看者展示。这些文字有传递信息和意义的意图,也有传递信息和意义的功能,所以它们具备了公共属性,可以被他的观看者识读并理解。这种类型的刻辞还有不少,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公元前13世纪,商王朝的贵族群体中,文字已经是一种公共交流的重要媒介,文字阅读行为已经存在了。

甲骨文中的记事刻辞在功能上和金文非常相似,可以判断二者是同一种类型的文本。这种类型的文本公元前13世纪已经成熟,它们在商代被刻于纪念物上,至西周时则被刻或铸于青铜器上。我们不能用进化论的线性观念来看这一文本类型的发展,更合理的判断是:这种纪念性文本曾经流行于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它的存在向我们说明,以阅读为目的而制作的文本在这一时代并不罕见。阅读行为的存在,意味着书籍已经出现。

综合上述五个方面,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判断殷墟时期(约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已经有了以竹简形式存在的书。

二、甲骨文时代书籍的可能类型

甲骨文时代的书和公元前10世纪以后的书籍文化关联不大,甲骨文、青铜器铭文里也没有留下任何与这些书籍有关的信息,但我们还是可以尝试推测当时书籍的可能类型。

第一类,占卜用书。卜书称占卜之象为兆,共有一百二十兆,每兆分作十爻,每爻也均有爻辞,称作颂,共有一千二百颂。《周礼·春官》: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

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2]1924-1926}

《左传·僖公四年》: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生奚齐。^[10]

这是卜书之爻辞见于文献者。这样的爻辞直到西汉初年仍有流传。《史记·孝文本纪》记载陈平、周勃灭掉吕氏家族后,使人迎代王刘恒入长安即天子位,他的大臣们,除了宋昌外,普遍担心刘恒入长安后会被谋杀,所以刘恒犹豫不敢前往,这时他想到了占卜:

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11]

“大横”就像《周易》中的“乾”“坤”“既济”“未济”一样,是兆象的名称,所占之辞,则是兆辞。这说明至汉文帝和武帝时,像《易》一样占卜所用的书仍然在流传。

第二类,世系。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提出《史记·殷本纪》里的殷商王朝世系与甲骨卜辞正好对应,由此证明了《史记》的可信。《史记》里的殷商世系不可能是殷商灭亡后出现的,因为这一王朝大约存在了600年,如果没有历史记录,其世系不可能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一世系最晚在甲骨文时代已经存在,并流传后世。这样的知识不太可能口头流传,大概率是以世系表或编年纪的形式制作成了竹书。

在甲骨文和《史记·殷本纪》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世系。商代的第一位王商汤之前的六代祖先,名字分别使用了甲、乙、丙、丁、壬、癸,换成数字表示便是1、2、3、4、9、10,在祭祀中,商代人习惯用死者死去那一天的干支日期作为祖先名字的一部分,如祖甲、祖乙、武丁等。但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死亡日期,商汤之前的六代先公分别以甲、乙、丙、丁、壬、癸命名,即商代的先公分别在1号、2号、3号、4号、9号和10号死亡,这是不可能之事。所以王国维判断这六代先公是商代人的追补,他们也不知道这六代先公的死亡日期了,于是就按照数字顺序补充上去。于省吾对此略有异议,他认为甲、乙、丙、丁四位

先公是后来补上去的,壬、癸两位应该是实际的祭祀名号:

王国维谓:“疑商人以日为名号,乃成汤以后之事,其先世诸公生卒之日,至汤有天下后定祀典名号时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故先公之次乃适与十日之次同,否则不应如此巧合也。”(原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董作宾谓:“我疑心这是武丁时代重修祀典时所定。……至于成汤以前先世忌日,似已不甚可考,武丁乃以十干之首尾名此六世。……观于甲乙丙丁壬癸的命名次第,并列十干首尾,可知如此命名,实有整齐划一之意,不然,无论此六世先公生日死日,皆不能够如此巧合。”(原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按王、董二氏均谓六世庙号为后人所追定,自来研契者并无异议。我认为,其说有得有失。六示中上甲和三报的庙号,乃后人所追定。至于六示中示壬、示癸的庙号,并非如此。^[12]

王国维、于省吾的判断其实差不多,他们都认为追补先公名号的事发生在商代初年,约公元前16世纪初,于省吾甚至认为商代初年是中国有成文历史的开始。董作宾的判断则略微保守,他认为在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中期前后。无论如何,至迟在武丁时期,商代已经有了完整的世系记录。

第三类,重要历史事件和军事活动的记录。《尚书·多士》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伪《孔传》云:“言汝所亲知,殷先世有册书典籍,说殷改夏王命之意。”^[13]

第四类,重要的王命和盟誓等文书。既然卜辞都需要记录下来以备核验,王命、盟誓等重要的文书,自然也会被记录下来。商周之际文化制度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周初的重要王命被记录和保存,并在几百年后成为《尚书》的主体。《尚书》里虽然有所谓的《商书》,但语言与春秋之后的文本太过接近,不能认为是商代文献的遗存。但考虑到周初有完备的王命的记录,商王盘庚之后的记录至少也应该是完备的,周灭商后,这类文献很难被周人保存,所以不传于后世。

既然甲骨文时代已经有了毛笔,卜辞为什么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刻下来呢?答案应该只有一个:刻辞不易更改。这很可能是为了保证核验占卜记录时每条记录的真实性。由此看来,商王朝对贞人、卜人等有非常严格的考核。将占卜记录写下或刻下来,说明在公元前13世纪人的观念里,最重要的信息需要依靠记录而不是记忆,对文字记录的依赖,说明对文字的某种信任已经出现。

三、西周中晚期的“礼制重构”与《诗》《书》的形成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里,商代和周代一般被当作两个历史阶段,殷周之际也被认为是一次文化和制度上的大变革时期,被称作“殷周革命”。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剧烈的一次变革,但是20世纪以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大量的殷周墓葬、青铜器以及其他遗址被发掘出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周代初年基本上是延续了商代晚期的制度和文化的,根本性的变革其实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这个改革过程的开端在周代的第六位王周恭王时代,此时已到西周中晚期。罗森、罗泰、曹玮、韩巍等学者关于西周礼制变革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早期经典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韩巍在《由新出青铜器再论“恭王长年说”》这篇重要的论文中讲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西周晚期青铜器在组合、形制、纹饰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礼制改革”或“礼制革命”。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将上述变化总结为五点:

1. 从商代继承下来的古代饮酒器逐渐消失,包括爵、角、觚、觶,以及在西周曾十分流行的盛酒器卣和尊。
2. 引入新的器物,包括大型壶、豆、盨、簠和匜。
3. 引入旧器物的新形式,包括直棱纹簠、水平瓦纹簠、饰以条纹的平沿鬲、釜。最后三种器物是由陶器器形发展而来。

4.从南方引进了带有管柄的新型乐器:钟。

5.完全相同的鼎或簋组成九鼎八簋(或七鼎六簋等等)的组合,用于表明等级。^{[14]84}

李峰认为这一次变革并非突变,而是渐变。韩巍依据最新的考古资料,也认为这是一次渐变,持续了近100年,大约从周恭王时期到周厉王时期。西周王朝的政治、经济体制在穆王、恭王之际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启了之后持续近百年的西周制度变革,这才是真正的“殷周革命”的发生阶段。周穆王、恭王时期政治、经济制度最主要的变化是“册命体制”和“世族政治”的成熟,这也是基础的制度鼎革。“西周中期后段的王朝政治是以‘世族政治’为内核,而以‘册命体制’为其外在的制度保障。所谓‘礼制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出现的。”^{[14]87}

所谓“礼制改革”,从考古资料所呈现的外在形式上看,便是以成套青铜器的不同组合来表示等级。这种以服饰、器物乃至特定曲目的

使用权为标志的制度形式,便是我们在传世文献中常看到并熟知的“礼乐制度”,它萌芽于周穆王、恭王之际,成熟于周厉王时期。这时出现了新的制度和文化形式以重组周代社会。我们可以从《诗经》中最古老的部分《周颂》来看这种变化。

《诗经》中的《周颂》一直被认为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末。然而当我们排除任何前见,去通读《周颂》,就会发现《周颂》的前几篇确实非常古老,即便借助注释也不容易理解。但从第四篇开始,大多数诗篇的语言已经没有那么古老,没有令人感到陌生的语法和词汇,似乎《周颂》诗篇的编纂有阶段性。特别让笔者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其中的农业祭祀诗存在两组,这是很不合理的现象。周代时每年的农业祭祀有两次,第一次是春天,第二次是秋天。春天祈求丰收,秋天祭祀以报答,同样的祭祀不可能各做两次。《周颂》中的第一组农业祭祀诗是《噫嘻》和《丰年》,第二组是《载芟》和《良耜》^③。我们看这

表1 《诗经·周颂》中的农业祭祀诗

第一组	第二组
<p>《噫嘻》 春夏祈谷于上帝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p>	<p>《载芟》 春借田而祈社稷也。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嘏其馐,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麋。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p>
<p>《丰年》 秋冬报也。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p>	<p>《良耜》 秋报社稷也。 翼翼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饷伊黍,其笠伊纠。其饔斯赵,以薊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挈挈,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栴,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牲牡,有捋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p>

四首诗(表1):

第一组祭祀的是上帝,第二组祭祀的则是社稷,二者的祭祀对象是不同的。籍田仪式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时代一直存在,完成于公元前397年或公元前396年的清华简《系年》第一章认为周王朝衰落的标志之一,即“宣王是始弃帝

籍弗田,立卅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15],《国语》记载“宣王即位,不籍千亩”^[16],《系年》《国语》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是同源的,但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故事。籍田制度在《周礼》《礼记》里的记载比较详细,汉文帝时重新复兴了籍田仪式。而春夏祭祀上帝的农业祭祀仪式,在文献

中几乎看不到。从字数上看,第二组诗字数是第一组的三四倍,是《周颂》里比较长的篇章,《载芣》还是其中最长的一篇。祭祀乐的时长一般不会有大的差别,同样的乐曲长度,字数越少,节奏越慢。因此《载芣》和《良耜》在节奏上比《噫嘻》和《丰年》快得多,它们不是同一类型的音乐。《载芣》和《良耜》在节奏上更接近于《大雅》和《小雅》的诗。故《噫嘻》《丰年》应早于《载芣》《良耜》。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第一组农业祭祀诗早于第二组,第二组诗取代了第一组,成为西周末年以后主要的农业祭祀乐歌。

如果《噫嘻》《丰年》和《载芣》《良耜》是两组先后存在的农业祭祀诗,《周颂》中是否还存在类似的结构?为了更好地看清楚《周颂》的结构,我们可以将其篇目次序排列出来,然后将《诗序》附上,就可以初步发现一些信息。《周颂》有三十一篇,以十篇或十一篇为一组平均分为三组,即“清庙之什”“臣工之什”和“闵予小子之什”。《诗序》的写作时代是一个历史疑案,依据今天所能看到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也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判断。《孔子诗论》等出土文献让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已经存在《诗序》类型的文献。但是即便没有《孔子诗论》,这样的结论也是很容易得出的。如《左传》里在外交场合的引诗,双方对诗义的理解与《诗序》几乎完全一样,《左传》的成书年代虽然是另一个大的问题,但其主要的材料完成于公元前350年以前,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孟子》的引诗与《左传》模式相似,也是默认了所引诗篇的主题,所以无论如何公元前350年以前知识阶层对《诗》三百各篇的理解,大体上已经形成了共识。汉代四家《诗》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从蔡邕《独断》载录的《鲁诗》《周颂》部分的小序看,《鲁诗》《毛诗》对三十一篇《周颂》的理解几乎没有区别^④。

祭祀乐歌会遵从礼仪规范,因为仪轨的限制,每篇的主题在流传中会相对稳定。相反,歌词在不同时代进行修润的可能性则颇高。处于二者中间的是乐曲的旋律和节奏,它们存在变化的可能,但幅度不会太大。故语词文本的研究虽然大体可以看出诗的早晚,但很难有可靠的结论。反而诗的组合和主题更能看出诗篇的

年代变化。《毛诗》《鲁诗》这两种不同学说体系的《周颂》在篇序和主题上几乎完全相同,这说明它们至少部分继承了早期《周颂》的样态,这是活态的《周颂》。

有了上述的认识,再看《周颂》的整体结构,就会发现《周颂》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是《清庙》至《时迈》,第二组是《执竞》至《潜》,第三组是《雍》至《般》。第一组以祭祀文王为主,主祭者为成王,兼及先公和天地、巡狩祭祀;第二组以祭祀武王为始,更多的是以后稷祭祀为中心的农业和渔猎祭祀;第三组则比较完备,以文王、武王和成王祭祀为中心,兼及农业、军事和巡狩。第一组和第二组合起来可以看作是上篇,并和《雍》之后的下篇形成对应关系(见表2)。

下半部分的《周颂》结构上更为完备,从篇次看似是晚出的一组。《清庙》和《雍》、《维清》和《武》《酌》、《烈文》和《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时迈》和《般》、《执竞》和《载见》、《噫嘻》和《载芣》、《振鹭》和《有客》、《丰年》和《良耜》、《有瞽》和《赉》在功能上是非常接近的。故在实际的祭祀演出中,只有《周颂》的上半部或下半部就够用了,没有必要重复。《周颂》下半部因为有着更为严整的结构,或说明这一组诗是相对晚出且规范化的成套组曲。相对而言,第一组和第二组诗就会略早一些。特别是第一组,《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等数篇语词尤显古老。另外,前两组和第三组诗对文王、成王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前两组称文王,第三组称大祖;前两组称成王,第三组称嗣王。从《周颂》的编次约略可以看出三十一篇作品的先后次序及其分组情况,也说明了周代祭祖乐舞至少发生过一次重构。

联系前文所述西周的礼制重构,我们似乎可以判断第三组祭祀乐应该出现于西周中晚期。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对此有很精微的观察:“西周晚期王室衰败……西周贵族中依旧保存着严格的等级关系……周天子直至被迫东迁,仍是贵族共主……世族间的纠纷……使西周晚期时的贵族家族深感旧有的社会关系已不可靠……在贵族阶级内出现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的、注重族人团结的风尚,此集中见于《诗经·大雅》、《小雅》中的一些诗篇。……诸

表2 《诗经·周颂》各篇对应关系

《周颂》上半部	《周颂》下半部
1.《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	17.《雍》，禘太祖也。
2.《维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18.《载见》，诸侯始见乎武王庙也。
3.《维清》，奏象舞也。	19.《有客》，微子来见祖庙也。
4.《烈文》，成王即政，诸侯祝祭也。	20.《武》，奏大武也。
5.《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21.《闵予小子》，嗣王朝于庙也。
6.《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22.《访落》，嗣王谋于庙也。
7.《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	23.《敬之》，群臣进戒嗣王也。
8.《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	24.《小毖》，嗣王求助也。
9.《执竞》，祀武王也。	25.《载芟》，春耕田而祈社稷也。
10.《思文》，后稷配天也。	26.《良耜》，秋报社稷也。
11.《臣工》，诸侯祝祭，遣于庙也。	27.《丝衣》，绎宾尸也。高子曰：“零星之尸也。”
12.《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	28.《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
13.《振鹭》，二王之后来祝祭也。	29.《桓》，讲武类祫也。桓，武志也。
14.《丰年》，秋冬报也。	30.《赉》，大封于庙也。赉，予也，言所以锡于善人也。
15.《有瞽》，始作乐而合乎祖也。	31.《般》，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
16.《潜》，季冬荐鱼，春献鲔也。	

诗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强调兄弟情谊，‘兄弟’在这里如作狭义的理解，应该理解为同族之兄弟；如作广义的理解……可以看作是同宗族人的代名词……《常棣》所咏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实际上即是强调同族人亲密无间的关系，以期依靠此种关系同舟共济，从而度过西周后期动荡不安的艰难时世。”^[17]从《诗》的整体上看，那些特别强调兄弟关系的诗篇，大多也被认为是幽厉时代的作品，如朱凤瀚所引的下述几篇：

戚戚兄弟，莫远具尔。（《大雅·行苇》）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小雅·斯干》）

笱豆有践，兄弟无远。（《小雅·伐木》）

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无胥远矣。（《小雅·角弓》）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小雅·常棣》）^⑤

西周确实是以分封宗族兄弟作为维护统治的主要手段，但随着畿外诸侯第二代、第三代的成长，他们与周王的亲戚关系自然会疏远。西周初年周王室的亲贵和其所倚仗的同盟集团掌控权力是很自然的，此后这些宗族走向衰落，新兴的贵族崛起。除穆王有意抑制大族之外，新

兴贵族的崛起还有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即至第二代、第三代分封贵族与周王的关系变得疏离，原来极为稳固的政治关系出现松动或崩溃^⑥。王畿尚且如此，畿外诸侯与王朝关系的疏离只会更甚。这个时候集中出现的反复吟咏兄弟之情的《诗》篇，说明它们被用来传递宗族一体的价值观。赵培在对《尚书》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观察：“在王室庇护乏力的情况下，各贵族均开始致力于内部团结，巩固宗法。于是出现了至少两种现象：一是文、武、成、康、周公等创业先王先公之训诰被重新汇编，以之凝聚宗族，因而出现了以《书》代《训》，出现二者名实之转；二是《诗经》中《大雅》、《小雅》很多诗篇开始歌颂‘兄弟’情谊，提倡保卫家邦。”^[18]

虽然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文献学的鸿沟，但考古所见西周宗族组织的衰落和《诗》篇歌咏的同步性，至少可以让我们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即西周中晚期，一些早期的诗歌和文章被重构，用来传递宗族观念，歌颂祖先的创业史。它们就是《诗》《书》最初的结集形式。如前所述，西周中晚期礼制变革的显在标志是列鼎制度的成熟与完善，以鼎簋组合来标示身份地位，与先秦礼书里以冠服、车制来表现等级的做法一样，都是将等级视觉化。成

套的青铜器陪葬组合最晚出现于恭王时期,甚至还有西周早期的例子,但在厉王、宣王以后非常稳定且流行,说明这套制度不是世族政治的产物,而是维护王权的象征,周初姬姓大族在厉王时代的复活,正是重整周人传统的表现。后世所谓的礼乐文化,其成熟期正是最早的《诗》《书》诞生的时代,即公元前10世纪末至公元前9世纪中期。它们与视觉化的等级相配合,强调兄弟与宗族,被用来在观念上重塑周代宗族社会的精神纽带。

四、《诗》《书》篇目的代际特征

上述判断,在传统的经典文化中,也有观念层面的佐证。从文献学角度看,最早的书应该是《诗》《书》和《易》。虽然它们不是历史上最早使用汉字书写的文本,也未必是最早出现的书籍,但它们是能够流传到后世的最早的书。它们一般被认为形成于周初,即公元前11世纪末,包括《诗经》中的部分《周颂》、《尚书》中的“周书”和《周易》中的部分卦爻辞。

《周易》早期文本的历史比较模糊,鉴于它是占筮所用的“辞典”,成书相对会早一些,但各地使用者的筮法会有差异,《周易》文本的变化也就会更多,出土的《周易》类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它最终的编次结构很可能要晚至汉代。

《诗》《书》收录的篇目呈现出相似的特点,即文本内容属于西周初的篇目很多,但西周中段的篇目几乎是空白。如果把《诗》《书》篇目的时代按照顺序具象化,两部文献看上去都像是一支杠铃。当然所谓《诗》《书》篇目的年代,依据的是战国时代形成的《诗序》和《书序》。一般而言,越是古老的文献,越难以判断其年代,依据这些战国以后文献记载做出的判断很难被认为是史实。这就是前文所述的“文献学鸿沟”。但是,从这些古老文献的编年结构,却可以发现公元前6—前4世纪时人们对周代文明的认知,即在公元前6—前4世纪,精英阶层普遍认为周文王、武王和成王时代是一切重要文明制度的创始时期,这一时期的文明足以成为后世的典范。这一观念让公元前6世纪的人在编纂《尚书》类文献时,有意选择了周初的各种

诏令和训诰。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种普遍的认知形成于有着较长传统的贵族教育,如果没有贵族的教育传统,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关于周代历史的知识。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很长的时段里,贵族学习的典范演说或王命,应该是以周初的篇目为主。也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会产生以周初文化为典范的观念,并影响到《尚书》和《诗经》最初的编纂,以及与之相伴的解释。

《诗经》和《尚书》篇目的汇集,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完成,也就是孔子出生的年代。此后半个世纪,这些最初形成的书籍被孔子用作教材,并做了重编,《诗经》和《尚书》的篇章结构初步形成,之后随着《春秋》学理论体系的逐渐完备,《诗》《书》的解释体系被重构,形成了依附于历史发展过程的经典解释理论^⑦。这一理论延续了公元前6世纪的认识,将西周初年文王、武王、成王时代看作西周历史的黄金年代,并特别突出了周公制礼作乐的意义。此后七个王的历史在这一理论里并不重要。及至周厉王,西周出现了动乱、衰落和灭亡,又变得重要起来,属于周厉王、宣王和幽王时代的诗,占了《大雅》和《小雅》诗篇大半,这个时候对《诗》的解释开始以王朝兴亡为线索。杠铃式的周代历史轮廓就是在这时最终成型的。传统文献学对《诗》《书》的解释,虽然依附于《春秋》学,但依然接受《诗》《书》的非连续性。

故即使在文献学层面我们无法判断早期《诗》《书》篇章的年代,但观念层面却可以看出代际特征。西周的贵族教育,让周初的很多篇章成为学习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尚书》一类的高级别的文献汇编几乎全部是西周初年篇章的原因。西周的灭亡,激发了新的历史反思,于是新的篇章进入经典文献的范围,特别是被认为控诉和讽刺周厉王、周幽王的诗篇成为《雅》诗的大宗。西周初和西周末在周人认知《诗》《书》的观念里,是两个起点或轴心,这在客观上建立了一个经典形成的年代框架。

总之,《诗》《书》开始受到特别的重视,很可能在西周中期。西周中期以前,虽然有诗,也有周王的诰命,但未必有作为经典的诗和书。公元前10世纪下半叶开始,周王朝的制度和文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诗》《书》作为经典的出现,应该就是在这一变革中完成的。这是中国书籍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时期。

注释

①葛亮:《一百二十年来甲骨文材料的初步统计》,《汉字汉语研究》2019年第4期。②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文中所引甲骨皆以其在该书中的编号标注,不再标注页码。③四首诗分别参见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60、462、472—473、474—475页。④《独断》有卢文弨乾隆五十五年辑本,乾隆嘉庆间嘉善谢氏抱经堂刻。卢文弨在文末按曰:“旧本《臣工》十句,《有客》十三句。案此不比《般》诗,毛七句,三家八句之有异同,直传写之误耳,今并改正。”⑤所引诗句分别参见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386、254、215、335、211—212页。⑥韩巍:《青铜器与周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230—231页。⑦袁行霈、徐建委、程苏东:《诗经国风新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页。

参考文献

- [1]张政烺.论易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2:59-60.
[2]孙诒让.周礼正义[M].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3]刘一曼.商代考古与甲骨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111-113.
[4]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M].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1188.
[5]方稚松.由一类特殊的占辞刻写现象谈甲骨刻辞的

- 重刻:从《合集》1075中的刮刻谈起[J].文献,2021(1):4-18.
[6]刘一曼.试论殷墟甲骨书辞[J].考古,1991(6):546-554.
[7]黄天树.关于商代文字书写与契刻的几个问题[M]//赵敏俐.中国诗歌研究:第1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3.
[8]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9]国家文物局.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59-60.
[10]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李梦生,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130.
[1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414.
[12]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93-194.
[13]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M].何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759.
[14]韩巍.青铜器与周史论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15]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上海:中西书局,2011:136.
[16]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15.
[17]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481-482.
[18]赵培.宗周政典的名实之转:从《训典》到《书》[M]//蔡宗齐.岭南学报:复刊第2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172.

Books and Classics in the Pre Confucian Era

Xu Jianwei

Abstract: The functions of books were diverse in ancient times, and not all books were intended for reading. By studying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such a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evolution of early book forms can be observed. Evidence from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ncluding characters written with a brush left on oracle bones, “册” representing books, writing directions, and grid lines imitating bamboo slips on oracle bones, indicates that bamboo and wood books were already existed in the 14th century BCE. In the 9th century BCE, some texts related to ancestral worship, including poems from rituals and ceremonies, royal edicts, and genealogical history, were selected as educational texts and endowed with the functions of reshaping beliefs, identity recognition, maintaining clan structures, and indicating hierarchy. These literary works are the earliest classic books in Chinese history, functioning as carriers of knowledge, ideas, and culture. They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education of the aristocracy, with the aim of reshaping Zhou society based on ancestral beliefs and bloodline heritage.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books; book form; reading behavior; order of articles

[责任编辑/知 然]